

## 从大山深处走出的文化世家

刘克敌

2020年11月末,我前往江西省修水县,参加修水县人民政府承办的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因为疫情,原本应在去年召开的这次会议延期到今年,又从上半年改在下半年,主题自然也由纪念陈寅恪逝世50周年改为纪念其诞辰130周年。

##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化世家

算起来这是我第三次到修水了。第一次是在20世纪末,当时从县城到陈家大屋尚无可通机动车的道路,我和当地的一位朋友是在乘坐一段汽车后又在山林中步行了两个小时才来到位于崇山峻岭中的竹塅——也就是陈氏家族的所在地,那所著名的陈家大屋就静静地坐落在一座小山脚下,周围有小溪流过。那一刻的感动我至今记忆犹新,这里是陈宝箴、陈三立的故居,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著名文化世家的出发地。

应陈氏后人的热情挽留,我们还在陈家大屋住了一夜,并品尝了陈家后人为招待贵宾才会做的当地美食修水哨子,它用芋头和红薯粉为皮,包着以虾米、腊肉、油豆腐和笋干做的馅,蒸熟后上桌,香味扑鼻。后来也几次吃过哨子,总感觉没有那第一次的味道鲜美。在有些昏暗的灯光下,听陈家后人讲述当年陈家人在此艰难创业的故事,那场景是我一生难忘的体验。如今这自然已不可能——陈家大屋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连住在里面的当地农民早都搬迁出来,更不允许游客在里面过夜。

记得在返回修水县城时,我们决定步行,选择了一条比较近却极为坎坷的山路,据朋友说当年陈寅恪的祖辈如果要去县城,很可能就走的是这样的山路。我至今记得走那山路的艰险,因为很多地方根本没有路,要靠朋友用手里的竹竿拨开密密的草丛,顺便吓跑可能藏在里面的毒蛇,当时正是盛夏,我们走不多远就已大汗淋漓,随身携带的一瓶水很快就被喝完。也就在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一个家族走出深山的艰难。作为客家人,陈氏家族依靠他们的辛勤和智慧,由一个棚户之家到耕读之家,再由耕读之家到仕宦之家,最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化世家。陈家数代人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无法衡量,他们所走过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很多中国农民的梦想,只是能够让梦想变为现实者少之又少。

第二次去修水,则是应修水县政府的邀请,为他们修建陈寅恪纪念馆及维修陈家大屋等事提一些建议,当时去陈家大屋的路已经可以勉强让小汽车通过,但陈家大屋依然破破烂烂,如何尽快修复已经迫在眉睫。由于当时还不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修水又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在资金筹集方面很有困难。不过当地政府还是表示,他们为陈寅恪及其家族生活

(上接16版)老余的爷爷是上世纪50年代成为国营瓷厂员工的。以后,从爷爷到父母再到他,一家三代,都是国营瓷厂员工。中国人取名,喜欢高大上,相声里曾讽刺过宇宙牌香烟,我没想到的是,景德镇真的曾有一家工厂,竟以宇宙为号。

在景德镇,4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十大瓷厂,宇宙瓷厂便是其中之一。今天的景德镇市区,有一个知名去处,即陶溪川。夜晚的陶瓷集市,招来了熙熙攘攘的人流,数百个以陶瓷产品为主的地摊沿路铺开,曲曲折折绕出好几百米。地摊背后那些房屋,无论工作室还是酒吧、商店、咖啡馆,一看就知道是改造过的老建筑。至于一根高耸入云的烟囱,更是直白地告诉每一个游人:这里曾是一家工厂。

是的,这就是一家曾经的瓷厂。上世纪50年代初,通过公私合营等手段,零星的工作坊被整合到一起,成立了十多家瓷厂:建国、人民、艺术、东风、新兴、光明、红星、红旗、宇宙、为民……十大瓷厂的成立使景德镇瓷业再次焕发生机,并由手工升格为机械,由柴窑升格为煤窑、油窑、气窑。

老余还记得,那时,瓷厂经常接受政治任务,比如生产国礼瓷、纪念瓷、国家领导人专用瓷等。如1978年邓小平出访美国,就曾将建国瓷厂生产的扁肚花瓶和双耳瓶作为国礼。

总而言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购统销,让景德镇瓷业走出了晚清和民国的阴影。在老余记忆中,小时候,由于父母都是瓷厂员工,这意味着每个月都有固定且不菲的收入,工厂经常发放各种福利,从住房到手套,从服装到逢年过节的食品,这种待遇,让其他非瓷厂员工的孩子无比羡慕。家里没有人在瓷厂工作,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景德镇人。所以,考大学时,他毫不犹豫地填报了景德镇陶瓷学院。

老余给我看过几张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的瓷厂老照片。黑白照片被岁月浸染得发黄,但那些在成型车间里劳作的工人,无论男女老少,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豪和幸福。

然而,老余大学毕业分回瓷厂不到两年,十大瓷厂纷纷衰落。1995年,随着企业转制,十大瓷厂一夜之间化整为零,尔后陆续倒闭。老余说,那年,连续几个月没发工资。有一天,满面焦虑的厂长召集开会,垂头丧气地对大



江西修水县陈家老屋外貌。

新华社资料片

## 重温陈寅恪对中西文化关系的阐释

所以陈寅恪才会十几岁就走出国门,然后海外留学20余年,广泛研究和了解西方文化却没有获得一个学位,因为他留学的目的不是镀金,而是寻找让中国文化重现辉煌的方法或途径。自19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强行进入和步步紧逼,传统文化陷入日趋衰落的境地,中国社会也因此遭受一次次动荡以及外敌入侵。“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困境”,就成为自龚自珍以来无数文人志士努力思考、探索的问题。

大致而言,一个多世纪来国人对于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有“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两条路径。前者以曾国藩、张之洞等人为代表,主张适当向外国学习,以渐进方式改革开放、维新变法;后者以胡适、陈独秀等人为代表,主张全盘引进外来文化,以激进乃至革命手段批判和摧毁一切传统文化。对此显然不能简单判定孰是孰非,而且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实践已经证明,一味闭关锁国当然不行,而门户洞开、全面西化也非正确的途径。也许从根本上而言,坚持以中国文化为根本,并大胆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最终形成中西文化的有机融合,才能让中国文化焕发生机,并有可能重现辉煌。

陈寅恪、胡适和鲁迅等一代文化大师,他们都曾长期留学海外,对西方文化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他们也都有极为深厚的国学功底,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也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尽管胡适、鲁迅等人在五四新文化时期也曾提出一些主张全面西化的过激口号,但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与保守派斗争的策略,在对传统文化的整体态度上他们的认识其实大同小异。

在涉及现实问题时,陈寅恪提出了一些极有价值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具体方法和方

式。首先,对于外来文化,陈寅恪指出不外有两种引进方式:直接引进与间接引进。对此陈寅恪进行了分析:“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发挥其特性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

在他看来,对外来文化的引进,必须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所引进的是不是“原装”的?第二,即使是“原装”的,还没有丧失本来精意,但是否对中国文化之改造有益?第三,即使有益在引进时是否也需要对其进行改造,以适应中国之特殊国情,以及如何改造?第四,其改造之后的结局如何?陈寅恪认为所有外来文化无论在其本土多么优良和有影响,在输入中国后都应有所改造以适应中国文化。

陈寅恪认为,中体西用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原则是不可变的,但在具体交流过程中,如何善于引进精华、拒绝糟粕,如何进行加工改造以及怎样把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融合,这仍然需要认真考虑。针对当时人们提出的“旧瓶装新酒”说,他提出了自己的“旧酒装新瓶”说。所谓瓶与酒的说法,只不过是一个比喻,它们之间实质上属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一些正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看来,中国文化正如一只古老的酒瓶,既可装“旧酒”,也可装“新酒”。

那么陈寅恪所谓的“新瓶旧酒”是什么意思呢?比如中国固有的制度风俗、三纲五常等是“旧酒”,而宋明儒学在吸收佛教后编织的新义理系统是“新瓶”,陈寅恪认为这一“新瓶”制作得不错,使中国文化得以成功地又延续数百年。其次,陈寅恪又提出了接受外来文化的一个具体方法:“避名实、取珠还椟”,这与“旧酒新瓶”理论相呼应,补充。他强调要吸收外来文化中的精华,而拒绝那些华而不实、不合中国国情的成分。当然,判定何为珠、何为椟就相当有难度,彼时彼地为珠者,此时此地则未必。何况椟本身虽华而不实,毕竟还有一点形式美的价值,而在特定情势下,形式之引进也可能成为第一需要。那么,标准就只能是站在中国文化立场上,以我之需要与否为是非。

历史总是充满了偶然和吊诡,时至今日我们看到伴随着全球化的退潮和民族主义思潮的重新兴起,对传统文化给予充分重视并对其进行富有创造性的转化,已经成为迫在眉睫之事。在这个意义上,重温陈寅恪等一代文化大师对中西文化关系的阐释,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话,如今有了新的注解。匠,不再指从事瓷业的工匠,而是指来自五湖四海的怀抱梦想与利器的陶瓷艺术家。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外地来景德镇进行艺术创作的非景德镇艺术家和文艺青年,已突破3万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3万“景德镇”里,有5000名左右的海外人士。

2005年暑假,英国人弗莉斯蒂·艾利芙第一次来到景德镇。琳琅满目的精美瓷器令她欣喜若狂,“整个城市似乎因瓷而生,遍地都能看到瓷器。”作为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博导,此前40多年,艾利芙一直尝试突破西方传统陶瓷,注入现代元素,但一直没找到从何下手。当她来到景德镇,在见证了2米多高的大型瓷器以及中国釉下彩与釉上彩手法时,她眼前一亮,茅塞顿开,当即决定留下来作一个“景德镇”。

之后几年,这个金发碧眼的异国艺术家,一直出没于景德镇的窑厂之间,走访当地工匠,访问中国陶瓷艺术家,一点一滴地学习、积累。2008年,经过几年摸索,她终于将自己在景德镇创作的巨型作品运回英国,进行了两年巡回展览。

某种意义上讲,“景德镇”不仅让景德镇陶瓷散发出新的活力,而且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这座城市。像范平这种资深艺术家,他们不仅带来了陶瓷有关的发明专利,而且,作为一名管理学博士,他还带来了更为现代的思想观念和运作思路,乃至更为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如今,景德镇既不是元明清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的劳动密集型工场,也不是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按部就班,各个工厂自成社会的国有企业,而是一座以瓷为核,艺术与生活相互交融的充满文化韵味的新型城市。

在范平把工作室落地景德镇之前半年,离开家乡20多年的老余也回来了。他辞掉了北京某文化公司总监的职位,回到家乡与两个昔年的同事重操旧业。他们组建了一家公司,主要业务就是为范平这样的陶艺家提供作品烧制。

范平的看法,与景德镇一些专家和官员英雄所见略同。景德镇的一位官员在接受媒

姚洪磊、项俊平

流年似水。无数的瞬间消失在生命长河中,如沙粒渐渐遗忘在记忆的角落里。但总有一些精彩的瞬间,不曾遗忘,不曾暗淡,仍然以一种特有的光芒,照亮时代的记忆,并且永恒。

2021年初,一本非虚构类图书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推出,书名比较独特:《瞬间的永恒——新华社高级记者方政军新闻日记五十年》;文本也耐人寻味,它并非一部日记体的回忆录,而是作者五十年新闻日记的原样呈现。一篇篇日记连接构成的史志文本,具有了类似纪录片创作中“纪实”影像带来的真实感、现场感和历史感。

通读这部长达一百多万字的上下两册的巨著,我们惊讶地发现:一名记者的私人日记,因为真实地记录了过去五十年间貌似平凡的新闻瞬间而弥足珍贵,具有强烈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方政军经历的新闻瞬间,不只是属于自己,还属于一群人、一个时代共同的记忆。

中国新闻学泰斗方汉奇先生评价道:“此书以及尚未出版的百万字原始记录是当代新闻史、社会学领域不可多得的贴近生活的时代缩影。该书的出版,既展示了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培养工作的成果,也为教学研究和战斗在第一线的新闻传播工作者提供了有研究和参考价值的高品位读物。”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原副主任、《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生前写给方政军同志的信中说:“通讯写得很好(指《今天是我们的节日——献给新中国第一个记者节》),那么大的历史跨度,那么多的重大事件,写得那么精练、概括,真是大手笔!”

方政军从农村走出,慢慢成长为一个新闻人,他半个世纪以来职业生涯的历史,自然贯穿着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历程。

在回顾自己几十年的从业经历时,方政军深有感慨地说:“文革期间,一些新闻报道沦为派系斗争的工具,这很可怕;改革开放初期,新闻成了某些官员、企业家升官发财、获取光环的筹码,这更为可悲;如今,不少新闻报道仍然存在捧官捧大款的有偿新闻现象,这是职业道德沦丧的表现,需要引起同行警惕。”在反思当中,他更强化了自己对新闻职业道德的认知:“从业几十年来,这些有着沉重代价的事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也深刻明白记者要‘先做人,再做新闻’的职业底线。”

在方政军看来,“作为记者,日常的动态报道要写,但那只是生活信息,新闻更需要发挥影响社会与时代的功能,这就需要记者要有铁肩担道义的精神,用心地投入到一些重大社会主题的报道当中去。”

方政军五十年来的新闻日记,虽然当时没有刻意写史的意念,但正是因其自然真切的详实记录,使很多人和事构成了新闻事业发展某些方面的历史佐证。

本书作为日记体裁,行文中虽然也有抒情,但更多是严谨的记事。作者五十年的新闻实践,中大量精彩的实战案例,是本书的一大看点。如果将从台前(发表的新闻稿件)到幕后(具体采访的过程)对照观读,读者会有非同寻常的收获。对于一个想成为一个优秀新闻记者的专业学子或是刚刚踏入新闻战线的年轻人,《瞬间的永恒》一书,正如同讲述“大片”创作过程的“纪录片”。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精彩案例,如“关于中国黑社会势力的系列调查”“长江簰洲湾溃口真相调查”等,书中都附有新闻作品的完整文本,且在代表性作品之后,又往往附有作者经验反思的文章。

如何写出好的新闻?方政军指出:“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广泛的知识面,多进行调查研究,从多方面论证。如果是批评报道,不仅要有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还要有第三方的权威意见和材料细节,这样的新闻稿件才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对于非事件性新闻的写作,记者要注意什么?方政军说道:“除了可读性、接近性外,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有受众,必须是党和人民关心的问题,才有生命力。而深入基层、乐于吃苦,是新闻记者取之不竭的精神力量。”

